

振荡中发展

新中国经济30年
于景森◎著

中央文献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振荡中发展/新中国经济 30 年/于景森著.

—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06.6

ISBN 7-5073-2134-7

I. 振… II. 于… III. 经济史—中国—1952~1982

IV. F129.7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6)第 062391 号

振荡中发展——新中国经济 30 年

著 者/于景森

责任编辑/李庆田

出版发行/中央文献出版社

地 址/北京西四北大街前毛家湾 1 号

邮 编/100017

经 销/新华书店

排 版/北京方方激光照排中心

印 刷/北京友谊印刷有限公司

680mm×960mm 16 开 26.75 印张 320 千字

2006 年 6 月第 1 版 2006 年 6 月第 1 次印刷

印 数:1—3000 册

ISBN 7-5073-2134-7

定价:39.80 元

版权所有 违者必究

写在前面的话

事物的发展，总是以波浪式前进、螺旋式上升的。社会的进步、经济的发展也是如此。我们不能说新中国经济建设的轨迹是按照这样的规律来筹划描绘并得以展开延伸，也不想为我国在探索社会主义建设中的某些失误正名，但从经过三年恢复的1952年到1982年党的十二大宣布拨乱反正任务胜利结束这30年间，中国经济在振荡中发展、在跃进中调整却体现和反映了这条规律，或者说印证了这条规律。邓小平在拨乱反正胜利10周年即1992年的南方谈话中深刻指出：“看起来我们的发展，总是要在某一个阶段，抓住机遇，加速搞几年，发现问题及时加以治理，尔后继续前进。”这恐怕也是对中国经济40多年建设历程的规律性总结。本书试图按照上述思路，在陈诗惠导师指导我作的硕士论文——《论党对经济建设指导思想的拨乱反正》基础上，利用业余时间，几经补充修改而成。希望能为同行提供一些资料或启发，同时也在这一卷首对所有帮助和关心我的人们表示衷心感谢！

谨以此书献给中国共产党成立85周年！

作 者

2006年4月

目 录

序 曲	(1)
第一幕 冒进·反冒进·反反冒进	(38)
一、风风雨雨合作化——不得不谈的话题	(38)
1. “小冒进”酝酿“大平衡”	(38)
2. 发展生产力的同时变革生产关系	(39)
3. 利用与消灭私有制的分歧	(40)
4. 毛泽东批评“四大自由”	(43)
5. 小发展和大发展之争	(47)
6. 报告的基调是反对右倾	(49)
7. 步伐过急事出有因	(51)
二、冒进与反冒进的较量	(54)
8. 辉煌的成就	(54)
9. 按平衡办事的单位就有问题	(56)
10. 千军万马，奔腾而来	(60)
11. 用冷水洗洗发热的头脑	(62)
12. 反冒进“一边倒”	(64)
13. 床上地下、地下床上地调查研究	(65)
14. 莫斯科的一声惊雷震醒了东方的盲目建设者	(68)
15. 强国安民的不朽篇章	(71)
16. 用舆论来澄清理论是非	(75)

17. 一次具有长远指导意义的历史性盛会 (77)

18. 把反冒进推向高潮：要重工业又要人民 (81)

三、共产党就是要“好大喜功”(83)

19. 事情正在起变化 (83)

20. 全会吹响了反反冒进的号角 (86)

21. 不要提“反冒进”这个名词 (88)

22. 毛泽东批评反冒进是有所指的 (93)

23. 思想有跟不上毛主席的地方 (96)

24. 是尾声还是开端 (98)

第二幕 跃进·大跃进·再跃进 (101)

四、“超英赶美”和“跑步进入共产主义” ... (101)

25. 国际上的“赶超”浪潮波及中国 (101)

26. 毛泽东流着泪咽下了黑硬的掺糠窝头 (106)

27. “跃进”一词的由来 (107)

28. 《乘风破浪》擂响了“大跃进”的战鼓 (110)

29. 踢开绊脚石 (112)

30. 毛泽东的个人崇拜观 (115)

31. 总路线·总战略·总动员 (119)

32. 到地方视察推动“大跃进”运动 (126)

33. 跃进再跃进 (130)

34. 一马当先，万马奔腾 (132)

35. 两三年过渡到共产主义 (133)

36. 毛泽东所设计的未来社会蓝图 (138)

37. 是一时的热血沸腾，还是潜意识的爆发 (141)

38. 对“大跃进”我们当时都没有反对 (144)

39. 人有多大胆，地有多大产 (147)

五、八个月纠“左”的努力	(148)
40. 毛泽东说：不要相信这些骗人的数字	(148)
41. 压缩空气	(151)
42. 有时真理在一个人手上	(153)
43. 价值法则是一所伟大的学校	(155)
44. 陈云临危受命收拾残局	(157)
45. 一吹二压三许愿	(160)
46. 轻松活泼“神仙会”	(161)
47. 一石击起千层浪	(164)
48. 山上阴云密布	(169)
49. 反右必出“左”，反“左”必出右	(171)
50. “右倾机会主义”帽子满天飞	(176)
51. 掀起“大跃进”的新高潮	(180)
六、大调整与“八字”方针	(183)
52. 大兴调查研究之风	(183)
53. 做好工作最根本的方法	(186)
54. 第一个“八字”方针的提出	(190)
55. 不开五级干部会议解决不了问题	(193)
56. 有人说是“三分天灾、七分人祸”	(194)
57. 毛泽东承认对许多经济问题还不懂得	(196)
58. 先抓吃穿用，实现农轻重	(199)
第三幕 战备·新飞跃·右倾回潮	(206)
七、经济建设要防备敌人突然袭击	(206)
59. 八亿人民八亿兵，万里江山万里营	(206)
60. 两个拳头和一个屁股要摆好	(210)
61. 建设“三线”是革命与不革命的问题	(212)
62. 管它什么“弹”，我们都要超过	(214)

63. 经济建设的第一次起落 (217)

64. 漫天阴霾划出一缕阳光 (220)

65. 狂风暴雨中的“太平盛世” (222)

66. 打倒新沙皇 (228)

八、促进国民经济的新飞跃 (231)

67. 以临战的姿态、跃进的步伐跨进 70 年代 (231)

68. 与帝修反抢时间争速度 (235)

69. 经济比例再次大幅度失衡 (238)

70. “三个突破”打乱了正常秩序 (242)

71. 机器声相闻，老死不相往来 (244)

九、经济调整“一波三折” (247)

72. 反对极“左”思潮的提法 (247)

73. 用经济观点再看“九一三” (251)

74. 质量问题是个路线问题 (254)

75. 怎么样学大寨 (257)

76. 利用劣根性和小私有者捞一把的欲望进行煽动 (261)

77. 江青说，这版在转移全国斗争大方向 (264)

78. 没有“王法”了 (267)

79. 农业的位置在哪？ (271)

80. 我们是“光荣孤立” (272)

第四幕 抢时间·洋冒进·抓纲治国 (276)

十、把被“文化大革命”耽误的时间夺回来 ... (276)

81. 不是成绩的成绩 (276)

82. 灾难性后果 (278)

83. 政治“冲击波”的经济表现 (284)

84. 冲出波谷 (287)

十一、“洋冒进”的来龙去脉	(291)
85. 时间补课 (291)	
86. 推动国民经济新跃进 (293)	
87. 速度是个政治问题 (297)	
88. 打几个高速度的歼灭战 (300)	
89. 特点是多了个“洋”字 (304)	
第五幕 经济建设指导思想的拨乱反正	(309)
十二、经济建设中“左”的错误指导思想的 初步总结	(309)
90. “左”倾理论的历史轨迹 (309)	
91. 以阶级斗争为纲, 放弃经济建设的中心地位 (316)	
92. 夸大主观意志, 忽视客观经济规律的作用 (319)	
93. 急于求成, 走了一条高速低效、僵化封闭的路子 (322)	
十三、拨乱反正的艰难启动	(327)
94. 为“唯生产力论”正名 (327)	
95. 把经济建设与科技发展联系起来 (330)	
96. 基本建设要少而精, 建立工程追究责任制 (333)	
97. 重谈经济规律和按劳分配原则 (335)	
98. “市场经济”的最初提法 (338)	
十四、根本性拨乱反正的全面展开	(342)
99. 确立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政治路线 (342)	
100. 精神动力和物质激励并举 (346)	
101. 必须从中国国情出发安排经济建设 (347)	
102. 经济工作必须按客观经济规律办事 (349)	
103. 冲破模式, 实行改革 (353)	
104. 打破封闭, 对外开放 (355)	



目

录



十五、拨乱反正的胜利完成 (357)

105. 经济建设新路子 (357)

106. 核心是提高经济效益 (360)

107. 另一个重要内容是“速度实在” (361)

108. 所有制形式的多样化 (362)

十六、几点宝贵的历史启示 (364)

109. 经济建设应为全党全国工作的中心 (364)

110. 中国国情是安排经济建设的基本出发点 (369)

111. 提高经济效益是全部经济工作的核心 (370)

112. 经济建设也要既反“左”又防右 (371)

附录一：八十年代的经济过热与治理整顿 (374)

附录二：九十年代的通货膨胀与“软着陆” (379)

附录三：苏联时期经济建设速度问题 (389)

附录四：印度独立后的经济建设速度问题 (406)

附录五：主要参考书目 (412)

序 曲

建国前夕，中国共产党发动了辽沈、淮海和平津“三大战役”，给蒋介石的国民党统治以沉重打击，取得了中国民族民主革命的最终胜利，建立了人民当家作主的新中国，翻开了中国历史的新篇章。建国初期，中国共产党在经济战线上也成功地进行了“三大战役”，即：稳定物价、统一财经；实行统购统销；对农业、手工业和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这“三大战役”的胜利，不仅充分说明了中国共产党既能“马上得天下”，更能“马上治天下”，还为大规模进行社会主义经济建设创造了前提条件。

“两统一调”首战大捷

1949年，随着人民解放战争在全国的胜利，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我们没收了国民党的官僚资本，掌握了国民经济的命脉，但我们接收的是一个十分落后的千疮百孔的烂摊子。

国民生产直线下降，严重萎缩。1949年与1936年相比，重工业生产大约下降70%，轻工业生产大约下降30%，农业生产大约下降25%。

通货膨胀如“脱缰野马”，难以控制。1949年以前的几年中，国民党政府长期滥发纸币，造成物价飞涨，每年是以几

十倍、几百倍以至上万倍的指数上涨的，投机猖獗，市场混乱。1947年7月24日，美联社电讯发表一则带有讽刺意味的材料说：法币100元可买的物品，1937年为2头牛，1941年为1口猪，1946年为1只鸡蛋，1947年则为1/3盒火柴了。1948年发行的“金圆券”，号称用金光闪闪的黄金作为储备金，可不到一年也几乎成了废纸。有人形容说，假如你进饭店吃饭，第一碗饭是一种价格，等你吃第二碗饭的时候又是另一种价格，因为涨价了。有许多人甚至用金圆券裱糊墙壁。

军费开支，日益浩大。500多万中国人民解放军主力部队，由于前进迅速，战线拉长，军费开支大，1949年占财政总收入的一半以上，1950年占41.1%。

对国民党政府留下来的军政人员约有900万人采取“包下来”的政策，需要新生政府保障生活，这在经济上无疑也是一个沉重的负担。

此外，由于敌人的分割，过去各解放区长期处于分散经营、各有货币、各管收支、各自供给的状况，在新的形势下加剧了新中国中央政府统一调度的困难。

还有，虽然新中国于1950年2月同苏联政府签订了《中苏友好同盟互助条约》，苏联对中国的经济建设进行了援助，但也不是很多。况且，美国在政治上孤立我们，在军事上包围我们，特别是在经济上进行封锁，隔断我们与西方国家的经济贸易往来。

凡此种种，都使我们在财政经济方面遇到极大的困难，使财经工作一时难以取得主动。当时部队作战费和脱产人员生活费，很大部分不得不靠发行钞票来解决。人民币的发行额，以1948年底为基数，到1949年11月增加约100倍，到1950年2月则增加270倍。新的通货膨胀，更加剧了经济困难。

新生的人民政权面临着严峻考验。

取得执政地位的中国共产党更面临着严峻考验。

中国共产党和人民政府有没有能力制止恶性通货膨胀和物价上涨，把经济形势稳定下来，把生产恢复起来，开始社会主义经济建设，使自己在经济上从而在政治上立住脚，取得与美国较量的更大胜利，这在当时是比进军和剿匪更加困难的新的严峻考验。

国民党人认为，中共虽然军事上取得了胜利，但肯定管不好经济。美国人也认为，中共解决不了几亿人的吃饭问题，是注定要失败的。国内的资产阶级说的更明确。上海的一些资本家说：“共产党是军事一百分，政治八十分，经济打零分。”还有些资本家公开发表评论说：“共产党马上得天下，不能马上治天下”。

这些，虽然都言过其实，有瞧不起我们这些“土包子”的意思，但我们自身没有经验、缺乏人才等状况也的确不容乐观。

早在七届二中全会前后，周恩来就以新政府总理的角色物色各种人选，他向毛泽东郑重提出，调陈云回中央主持财经工作。

陈云，出生于江苏青浦县（今属上海市青浦区）的一个小镇，自幼父母双亡靠舅舅抚养长大。儿时经常帮舅舅料理小饭铺的生意，耳濡目染，慢慢懂得了一些经营方法以及熟练的珠算技巧。在上海商务印书馆当学徒期间，不但学到了许多经营管理方面的基础知识，而且接触了许多经济运行中各种规律性的东西。这些培养了陈云对经济工作特殊的兴趣和才能，对他后来的经济思想也产生了深远影响。直到20世纪70年代，陈云在谈到国际信贷问题时还说：这“和过去上海、天津那些银行、钱庄一样，看到哪家生意做好了，就找上门来了，无非是要些利润。”^①

^① 陈云听取中国人民银行工作汇报时的谈话记录，1973年6月7日。

□ 振荡中发展

周恩来向中央举荐陈云决非偶然，他对陈云的了解从二三十年代的上海时期就开始了。当时，陈云开办商业机构为党中央筹集活动经费所表现出来的经营头脑和果敢、干练，受到了党中央和共产国际的表扬，也引起了周恩来的注意，并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毛泽东认识陈云要比周恩来晚，但至少从遵义会议开始，陈云是毛泽东的支持者之一。遵义会议后，毛泽东把回上海重组党组织、恢复与共产国际联系的重任，委托给陈云。由此可见，毛泽东对陈云已经有了较深的印象，并且是非常信任的。延安时期，陈云突出的经济才能，也引起了毛泽东的重视。

辽沈战役胜利以后，陈云在领导接管大城市、恢复生产和发展经济等财经工作中，充分发挥了善于理财的本领，受到了毛泽东、周恩来等的特别关注。毛泽东的“原封原样接受”等经济思想，实际上就是吸收了陈云的成功做法。从这时起，周恩来开始就全国财经方面的一些重大问题征求陈云的意见。

正因如此，周恩来的建议一经提出立即得到了毛泽东和中央其他领导同志的赞同。1949年2月6日，毛泽东致电中共中央东北局：请陈云来中央一叙。

中央财政经济委员会（简称中财委）是中国共产党在经济战线的统一领导机构，计划并领导国家的财政经济工作，此时已改设在北京东城的九爷府。九爷府原为清朝王爷的府第，但经过几百年的风雨沧桑，昔日王府的繁华早已荡然无存，剩下的只是高大宽敞的房子。中财委组建之初，只有几十人，住在九爷府里很宽松，但随着各路人马的陆续到来，也变得拥挤不堪，甚至有些高层官员不得不把洗手间当办公室。这样，这座破落拥挤的旧王府成了新中国经济工作的统

帅部，陈云也就是在这里率领中财委的一班人指挥了一次又一次的重大“战役”。

上海解放后，一项迫在眉睫的工作摆在陈云的案头：人民解放军虽然进占了上海，人民币却“进”不了上海。

上海是中国经济的中心，人民币控制不了上海，就控制不了全国。

投机分子利用银元兴风作浪，企图把人民币排斥在上海市场之外。投机奸商的总指挥部是上海的证券大楼，他们利用几千部电话同分布在全市各个角落的分支据点保持密切联系，任意哄抬银元价格。一时间“银牛”（贩卖银元的贩子）横行，“大头”（印有袁世凯头像的银元）嚣张，银元和人民币之间的比价一涨再涨；每一条主要马路上，都有身着长衫的贩子，手击银元，叮当作响，吸引行人，还不断报出银元行情，搞得人心惶惶；物价狂涨，商店拒收人民币。人民币早上发出去，晚上又差不多全回到了人民银行。人民币的信用受到了严重的威胁。

起初，为了稳住市场，华东财委采取了抛售银元的办法，但上海游资和投机分子的实力太雄厚了，10万银元抛出后，全被投机分子吃进，投机之风愈演愈烈。

当年，日本占领上海后，一次投下去5吨黄金，也如同泥牛入海。

陈云接到华东财委的报告后，决定用强硬手段查封证券大楼，严惩投机分子。

上海市军管会经过周密准备，于6月10日上午8时，派公安局长李士英率200余名便衣警察分散进入证券大楼，控制活动场所和通道；10时，警备司令宋时轮率警卫部队分五路包围大楼。里应外合，一举获得胜利。

平息上海银元风波之后，全国物价相对比较平稳，但陈云

序

曲

◇

○

◇

○

隐隐感到一场大的经济风暴将要到来。

他认为，解决上海问题和全国物价的关键是抓住“两白一黑”，“两白”即大米和纱布，“一黑”即煤炭。因为这三样东西是人民的命根子，一时也缺不了。也正因如此，这些也往往是投机分子和游资冲击的主要对象。而其中最关键的又是大米和纱布。对此，陈云明确指出：粮食和纱布，一个是吃，一个是穿，“是市场的主要物资，我掌握多少，即是控制市场力量的大小。”“人心乱不乱，在城市中心是粮食，在农村主要靠纱布。”

事情果然不出陈云所料，资本家和投机势力都看准了上海纱布急剧上涨的行情，企图以纱布为突破口，再次掀起物价风潮，与新生政权在经济领域再次较量。

中财委和陈云对经济形势进行了认真分析：在上海，主要是由于纱布短缺，引起了投机势力的囤积，而当时华北受灾，棉产区粮食很贵，北方的投机势力也很有可能大打粮食的主意，到那时，我们将不得不在两个战场上同时作战。为了避免腹背受敌，陈云决定分两步走：第一步是紧急调拨东北粮食支援华北市场，彻底打消粮食贩子的投机企图，稳住北方的粮食市场；第二步是全力以赴对付上海的投机势力。

斗争策略已定，剩下的就是果敢的行动。11月13日，陈云为中财委起草致各地指示电，连续发出12道指令，可谓“十二道金牌”。其主要意思是：各部门协调作战，限制物价，调集纱布，收缩银根，压缩开支，预定11月末12月初，全国各主要城市一齐抛售。为了有利地打击投机势力，让投机分子把囤积的棉纱布，怎么吃进去的再怎么吐出来，陈云还在第12道指令中特地指出：

对于投机商人，应在此次行动中给予适当教训。

为此，（甲）目前抢购风盛时，我应乘机将冷货呆货

抛给投机商,但不要给其主要物资,(乙)等到收缩银根、物价平衡,商人吐出主要物资时,我应乘机买进。^①

陈云起草完电报后,当晚立即上报中央。日理万机的周恩来也意识到了问题的严重性,在百忙之中特别关注此事,在电报上批示:“如主席未睡,请即送阅。如睡,望先发,发后送阅。”^② 作为战略家的毛泽东敏锐地感觉到这是一桩事关全国政治、军事特别是经济全局的大问题,他看到电报后,当即批示:“即刻发,发后再送刘、朱。”

一场全国范围内稳定物价、打击投机势力的战斗悄然拉开了帷幕。

此时,投机分子还蒙在鼓里,得意忘形。

11月25日,陈云命令全国采取统一步骤,在上海、北京、天津、武汉、沈阳、西安等大城市大量抛售纱布。

一开始,上海等地的资本家和投机势力一看有纱布售出立即拿出全部储蓄争相购入,甚至不惜借高利贷,致使上海的借贷出现了以日计息的现象,上海人称之为“日拆”,这在上海、全中国乃至全世界都是罕见的。投机分子有自己的小算盘,根据他们过去的经验,纱布价格一天之内涨好几次,吃进纱布以后,当天转手,不但可以应付日拆,还可以获高利。

然而,这次他们打错了算盘,上海等地的国营纱布公司,源源不断地抛售纱布,而且一边抛售,一边降低牌价,投机讲究的是买涨不买落,投机者知道上当了,也开始抛售自己手中的纱布,但他们抛得越多,市场行情跌得越快,上海的纱布价格一天之内下降了一半,投机分子叫苦不迭。

① 《陈云文选》第二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30~31页。

②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金冲及、陈群主编:《陈云传》(上),中央文献出版社2005年版,第645页。

与此同时，我们采取征税、收公债款、不准私营工厂关门且照发工人工资、国营企业的钱存入银行不准贷给私营银行和资本家企业等“四路进兵”，穷追不舍。

有人跟陈云说，这些招是不是太狠了？

陈云说，不狠，不这样，就天下大乱。

这样一来，资本家和投机分子两面挨打，再也受不住了。不得不要求我们出面，买回他们吃进的棉纱。我们则乘机以极低的价格买进了大量棉纱。

陈云指挥的这场战斗，干净、利索，使投机分子受到了沉重的打击。有些资本家血本无归，应付不了日拆，跳楼自杀；有的卷起铺盖逃往香港。

稳定物价战斗的胜利，是我国财政经济状况根本好转的前奏。经过几个回合的斗争，资产阶级和投机分子彻底服输了，再也不敢在市场上兴风作浪。加上我们采取的其他措施，国民党留下的十几年恶性通货膨胀终于被遏制了，上海和全国的物价迅速稳定了下来。举几个数字来说明一下：上海的批发物价指数，以上海解放后第一个月即1949年6月为100，到1950年2月猛增到2097.9，上涨二十多倍；打击投机和统一财经后，以1950年3月全国的批发物价指数为100，到1950年12月为85.4，1951年12月为92.4，1952年12月为92.6，保持稳定并略有回落。

毛泽东对此进行了高度的评价说，它的意义“不下于淮海战役”^①。毛泽东还极力称道陈云的理财能力，他借用诸葛亮在《前出师表》里叙述刘备夸奖向宠的用语（原文为：“将军向宠，性行淑均，晓畅军事，试用于昔日，先帝称之曰：能。”）来称赞陈云这种理财能力为“能”。

^① 薄一波：《陈云的业绩与风范长存》，见1996年4月10日《人民日报》。